

乡村人际传播中的村干部形象¹⁾

熊顺聪

摘要 村干部是国家政权的代理人,也是农村社会的当家人,他们也是农村人际传播中的重要成员。本文以村干部的形象为切入点,探讨他们在角色扮演过程中所形成的人际网络,以及他们在农村人际传播中的核心地位,并借用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经典传播过程模式,分析村干部人群的人际传播的具体过程,探索村干部在乡村人际传播中的不同角色。

关键词 村干部;乡村人际传播;人际传播角色

中图分类号G22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熊顺聪,广西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广西柳州545006

有关农村社会的传播,学界已有一些讨论。有学者指出,“大众传媒是农村发展的动力,不仅提供信息,而且能够改变农民陈旧保守的观念,形成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1]。也有学者指出,乡村传播具有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功能^[2]。李红艳将乡村传播与新农村建设联系起来思考,指出乡村传播对于农村发展具有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认为,乡村传播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自我传播等传播类型^[3]。由于农村人际关系在血缘、亲情、面子等因素在农村人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因此,人际传播在乡村传播中占据核心地位。如果将村干部扮演的角色与乡村人际传播有机结合,或许能增强农村社会的人际传播。

一、村干部的角色

村干部是指以行政村党支部、村委会的主要干部为代表的干部群体。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村干部包括党支部正、副书记、村委会正、副主任、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妇联主任、共青团书记和会计等;狭义的村干部只指党支部正、副书记、村委会正、副主任等村里的主要干部。他们大多来源于农民群体,没有被纳入到公务员编制,即不是“官”,也不是“干部”,他们通常可以获得一定的“务工补贴”,他们是乡村公共事务的领导人。

角色与地位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从戏剧借用而来。齐美尔最早

1)基金项目 201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村干部行为与出入机制比较研究”(12XZZ014)

使用角色概念,自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林顿把身份和角色匹配在一起来讨论,他把角色看作身份的动态表现,并区分出先赋性地位(ascribed status)和自致性地位(achieved status),并指出多重角色的相互关联的方式构成了社会体系。对于村干部角色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派别。主要有国家政权的代理人,乡村社会的保护者和双重角色下的经纪人几种观点:

(一)国家政权的代理人角色

对于村干部而言,他们也会通过自己的地位和扮演的多重角色来构建农村的社会体系。随着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中央政府通过乡政府取代人民公社,村委会代替生产大队来实现乡村社会的治理。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村干部扮演着国家政权的代理人角色。对于村干部而言,他们也会通过自己的地位和扮演的多重角色来构建农村的社会体系。

美国学者萧凤霞也认为,村干部的权力来源于党和国家,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针是他们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就决定了他们不是村庄集体利益的代理人,而是党和国家在农村治理中的代理人。村干部的选举虽然在理论上实现了村民们自由、公平的民主选举,但实证研究表明,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的村干部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乡镇政府和村党支部的影响。

(二)乡村社会的经营者角色

村干部的“经营者”角色来源于结构取向。Shue认为,农村改革后,政府欲打破限制了国家对农村进行渗透和控制的地方政治圈,农村经济商品化扩大了过去建立在类似细胞组合的社会结构之上的农民和干部的交往范围,以市场为基础的“网状”(web)结构取代了人民公社时期的“蜂窝状”结构,地方乡村干部角色越来越向公司的经营者靠近。杨善华、苏红将经营者角色研究放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动态过程之中,认为村干部经历了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的角色转变。^[4]于建荣指出,村委会是个经济实体,在具体的实践中,村干部是农村集体利益的“当家人”,维护着村民的集体利益。^[5]

(三)国家与社会双向庇护下的双重代理人

“代理人”和“当家人”角色在村干部扮演的过程中,村干部的角色表现为中间人。村干部既是代理,又像当家人,综合起来,似乎是乡村的中间人。徐勇指出,人民公社制废除后,村干部角色有着双重的期待,国家要通过乡镇政府对农村社会进行行政治理,因此,村干部需要完成乡镇政府交办的任务,扮演着政府代理人的角色;而村委会使得农民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村干部管理着本村事务,他们是乡村大家庭的“当家人”。村干部在代理人与当家人的双重角色中斡旋博弈。^[6]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戴慕珍(Jean Oi)以“庇护关系”来解释村干部角色,强调村干部在国家和农民之间是一种庇护与侍从(patron-client system)的关系,国家是农民的庇护者,农民依附于国家以获得最大利益^[7]。她后来的研究指出在这种庇护关系之下,村干部能斡旋于国家、党和村民之间,实现国家意志、农民要求和个人利益间的某种平衡。

社会中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位置之上,村干部处于农村社会结构中的上层,他们拥有着更多的社会财富和资本,他们是农村社会的精英。村干部会通过各种圈子来构建自己的社会网络。正如国外学者研究指出,中国的村民选举是嵌套在村民的人际关系网之中的。^[8]这些关系网络影响着村民的人际交往,致富信息技术的获得,工作机会的获取,贷款申请或是某些扶贫项目的争取,甚至是子女入学,户口迁移等也受这些关系网络的影响。

二、村干部的人际互动传播

中国农村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决定了村民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会通过关系诸如家庭、家族、亲戚等形成“强关系”,通过宗族、同学、战友、亲家等关系来进行交往,形成农村社会关系中的“弱关系”。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够体现当时最为典型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农村社会人际关系——“差序格局”理论。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是“把一块石头,

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血缘和地缘关系不容个人选择。因此,村干部的社会网络按照以“己”为中心水波纹似地往外推分布的,越靠近村干部的关系越强,反之越弱。也就是说,村干部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有:一是家庭关系;二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亲缘关系;三是基于交往形成的业缘或是地缘关系;四是以村干部角色为基础建立的新的业缘关系即“国家政权代理人”和“乡村利益保护人”角色扮演下的同乡镇干部和村民之间所形成的业缘关系。

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是传播过程经典模式,即:谁(who)——说什么(what)——对谁(whom)说——通过什么渠道(what 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hat effect)描绘出了信息传播的最初形式——人际传播。一切其它形式的传播都是这一人际传播的某种延伸。并且由于人际传播是小范围内、无中间环节的双向传播,因此可以减少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扭曲现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农村的人际传播由于不受物质条件的制约,也不受传播人员较高素质等方面的影响,它的传播效果和影响比其他传播媒介更为经常、更为有效。

村干部社会网络下的人际传播过程可以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来理解,即村干部对村民以口头的方式所讲的内容及其所起的效果就是村干部网络下的人际传播,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考虑:

(一)谁(who)

村委会选举制度在中国农村的建立,村干部的产生方式发生了转向,从过去的由乡镇政府决定村干部的去留转向了在乡镇政府指导下的村民自决。这种竞争性的选举就决定了那些具有大的家族势力、带头致富的经济精英、德高望重的社会精英、知识技术人才等被选中的机会要大得多。有学者通过实地调研指出宗族背景尤其是在宗族实力、“裙带现象”的权力继替、亲缘因素等方面影响着村干部的出任机制^[9]。而那些在村庄中具有一定经济、文化、社会影响力的村民,

如乡绅、宗族长老、经济能人、民间文化人、乡村医生等人群,可以通过血缘关系、个人的魅力、同学关系、战友关系、朋友关系、经济利益关系等竞选到村干部的队伍之中。田先红在农村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税费改革之后村民对于村干部的角色期待有了很大的变化。村民希望村干部能给村里带来利益,因此,那些有“关系”、有“背景”的“能人”、“精英”更容易登上村庄政治舞台,“能人”逻辑逐步替代“好人”逻辑。^[10]另外,挂职村干部、驻村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等群体也加入到了村干部队伍的行列。

(二)说什么(what)

在人际传播中,村干部传播什么呢?村干部与农民的互动传播主要在政治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传播内容主要是政策的制定、实施与反馈等等。农村各项工作的展开包括农村经济传播、农业科技传播、法律知识传播、健康知识传播和文化知识的传播等。大众媒介向农民所传播的信息和观点,并不是直接流向村民的,而是要经过一部分积极接受的村民群体,他们率先从大众传媒获取信息,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再以人际传播媒体的方式来影响周围的人。这部分村民群体是农村社会的革新者,通常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教育背景,以村干部为主,他们能积极接受大众媒介信息并形成自己的解读,再以人际传播的方式将信息传给普通村民。

(三)对谁(whom)

1.对于上级乡(镇)干部群体的传播。《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三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即在保护乡村利益的同时,还需要代理国家政权,贯彻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通常村委会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工作主要有:计划生育、征兵、征购粮入库、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这些上行下达的工作交往主要是通过召开村干部会议、下乡检查工作和派任驻村干部的方式实现的;另外,村干部也需要上行工作交往,以汇报工作和寻求资源;也有一些私人交往诸如酒宴上的聚会、给乡(镇)干部送礼、为乡(镇)干部办私

事,形成了工作交往和私人交往的相互缠合的交往特点^[11]。这种特点也就决定了乡村人际传播的主体地位。

2.对于村民,村干部农村社会网络中的重要一环。通常,村干部对于乡村社会的治理又是通过村民小组长来实现。村民小组长大多者年富力、有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和传统习俗的影响,中国农民历来重视多子多福,一个人往往有好几个兄弟姐妹,这样便形成大量的亲缘关系,通常,人们对家庭成员和亲戚的信任远远高于其他人。因此,村干部人际传播的受众主要是那些村民小组长及与村干部及其家族成员具有“强关系”的村民。

(四)渠道(what channel)

村干部在完成传达、执行上级政府下达的行政命令等任务时,除了开会,标语口号等宣传形式之外,更多的是入户交流。在农忙时期,人际互动内容大都为与农事有关的帮工与换工。在农闲时期,小商店、洗衣亭、麻将桌、牌桌成为人们谈论事情、交流互动的场所。这种闲聊的方式也是村干部人际传播的主要方式。农村人际传播的活跃事件,诸如村委会选举、红白喜事、乔迁、小孩满月、周岁等,村干部是农村社会里的精英群体,在村民的心目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村民们的红白喜事等通常都会邀请村干部参与或是主持这些事件。村民们此时的互动和人际传播的内容甚广,村干部此时传播的内容大多是一些村里的婚丧嫁娶等一些鸡毛蒜皮的聊天、闲话甚至是谣言等。

(五)效果(what effect)

村干部通过人际传播,实现了信息的交流;通过人际传播,实现村干部的自我认识,村民通过人际之间的传播实现了情感、归属、需求、控制等方面的人际需求,维系人情往来。通过人际传播,村干部整合了民间力量,实现了乡村社会的集体行动,为农村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奠定了基础。

三、强化村干部在农村人际传播中的角色

制度经济学家格兰诺特指出,经济活动嵌套于社会关系之中,因此,理性选择理论的专家们

通过囚徒困境的博弈,指出人的理性选择是人与人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计算性信任(calculative trust)的结果。随后的实验表明,角色定位和角色集决定人的行为举止,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角色扮演者的主观理解所决定(Subj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situation-the role evoked in players)^[12]。

由于农村社会固有的制度和文化习惯和大众传媒对于农村传播的弱化,决定了农民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接收、过滤和传播接收到的信息。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的转变,意识形态教育在开始淡化,随之而来的村民自治表明国家淡出农村社会,乡村传播特别是制度性安排的大众传播也因此淡出农村社会。乡村传播是指乡村社会的传播类型、传播模式、传播效果、传播文化、传播者、受众及与乡村社会发生信息交流的活动。在这一信源到信宿的传播活动中,人际传播占据着主要地位。

虽然农村人际传播的主体主要有普通村民、乡村大学生、乡村干部、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返乡农民工等群体,但是村干部在农村社会中,他们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并且具备将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转换的能力。因此,在乡村的人际传播过程中,村干部通常处于人际传播的中心,他们是农村社会中人际传播的信息受传者,同时也是传播者和把关人。村干部需要在农村人际传播中扮演好以下角色:

(一)农村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角色。由于村干部产生于一些家族领袖、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经济精英、以及一些外来人员诸如大学生村干部等,他们是乡村人际传播活动中的意见领袖。在乡村人际传播过程中,他们是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中间变量。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公认的权威、威望、过人的人格魅力、雄厚的经济基础等特质,他们对于人际传播信息的加工过滤,可以通过交谈、争论、会议等多种强势的方式将其转达给民众。大众传播中广播、电视、报纸、书刊等都要求民众需要相当的文化素质和一定的文字理解能力。由于民众普遍的文化素质相对不高,因此,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的

大量信息也需要经过村干部的再次转换,以人际传播的方式来向民众传播。正如周向红等人的研究表明,村干部是农村社会的意见领袖,他们是现阶段农村公共政策宣传的重要变量^[13]。

(二)现代观念的传播者。村干部的个人网络在农村资源动员或是集体行动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在培育农民的公共参与、法律意识及其人际信任或是信用意识过程中,村干部扮演着重要的传播者角色。因此,应充分利用地方资源,采取多种形式,培训好村干部特别是村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会计等一把手们的人际传播相关知识。

(三)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中介者。传播学原理认为,传播者决定着信息的内容。在农村人际传播过程中,村干部群体本身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传者。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村干部可以通过专业权威的观点及资深评论,对特定问题保持发言权,在科学、权威的信息传播中树立自己的公信力。在农村社会的革新和新技术的人际传播方面,他们可以言传身教,扮演好技术革新者和推广者的角色。作为农村社会各种信息的受传者,由于中、省、市等大众媒体对地方的传播问题鞭长莫及,农村传播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再加之农村社会的急剧变革、农民受教育水平低、农民的同质化和农村社区的封闭性、农村谣言转述方式更便捷等原因,流言肆无忌惮地泛滥^[14]。因此,村干部则需要过滤谣言信息,扮演好谣言的澄清者或终止者角色。

四、结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信息的传播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电视下乡、手机普及、网络逐渐深入等已经成为现今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媒体技术已经在农民、基层干部和中央政府之间建构了一种新的关系^[15]。然而,村干部在国家与社会框架下扮演着不同角色,他们在农村社会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他们用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将大众媒介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传播的受传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后

再次以人际传播为主的方式将信息传播给民众。农村社区的维系控制在基层村干部的手中,实际上,他们是农村社会人际传播的话语控制人,在农村信息的采集、传播、加工、接受等所有环节都应当将村干部放到人际传播中的关键地位。因此,应高度重视将村干部培养成为农村社会中的意见领袖,加强农村信息化,解决农村信息化过程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强化舆论引导,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 [1]蔡骥,党美锦.大众传媒与中国农村发展[J].新闻传播.2006(7).
- [2]费爱华.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J].学海.2011(5).
- [3]李红艳.关于乡村传播与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 [4]杨善华,苏红.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J].社会学研究.2002(4).
- [5]于建嵘.新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础和发展方向[J].中国农村观察.2002(1).
- [6]吴毅.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J].管理世界.2002(11).
- [7]OIJC."Communism and Clientelism: Rural Politics in China".World Politics.1985:372.
- [8]KELLIHER D."The Chinese debate over village self-government".The China Journal.1997:37.
- [9]肖唐镖.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3).
- [10]田先红.医改后农民对村干部角色期待的变化[J].学习月刊.2011(13).
- [11]王荣武,王思斌.乡村干部之间的交往结构分析——河南省一乡三村调查[J].社会学研究.1995(3).
- [12]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
- [13]周向红,徐翔.意见领袖:现阶段农村公共政策宣传的重要变量[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 [14]褚杭.社会心理学视域下农村谣言产生的成因及防范[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4).
- [15]张世勇.干群交流的困境——从电视下乡后农村政策传播过程的角度谈[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